



# 国家安全 研究

何贻纶 著

人民出版社

# 国 家 安 全 研 究

何贻纶 著

人民出版社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重点项目  
福建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陈鹏鸣

版式设计：何 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安全研究 / 何贻纶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 - 01 - 005099 - 6

I. 国… II. 何… III. 国家安全—研究

IV. D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348 号

国 家 安 全 研 究

GUOJIA ANQUAN YANJIU

何 贻 纶 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209 千字 印数：1000 册

ISBN 7 - 01 - 005099 - 6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何贻纶** 1950年2月出生。现任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

1969年5月中学毕业，先后在农村插队、工厂当工人。1982年1月毕业与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政治教育专业，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工作。1987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生班，1988年通过论文答辩，获硕士学位。毕业留校工作以来，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

学术团体兼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中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学术研究专长：中国国家国际战略、国家安全管理等课题的研究。

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主编、参编《政治学与行政学丛书》、《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当代资本主义》学术专著、教材等10余部。其中教材《政治学与行政学丛书》第二主编，获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经济全球化与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若干问题探要》独撰，获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独撰，获福建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 前 言

2003年5月中旬,正当“非典”肆虐中华大地之时,笔者因公出差到武汉,所下榻的宾馆,住店的旅客就只有我们同行的三、四人,自打那时起,开始酝酿国家安全的研究,本书的写作始于2004年2月,在写作过程中,传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将“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全会要求:要“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这为笔者研究国家安全规定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这亦是本书的宗旨,也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因此也可以说,本书正是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而作。

构建国家安全机制的前提是如何解决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问题。自古以来“什么是国家安全?”、“应该怎样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世界各国无不关注的重要问题。世界各国的政界、学术界一直以不同的语言文字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思考和谈论的问题,但是至今为止,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都不尽如人意。

在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国家安

全”这个概念,但很早就思考如何维护“国家”的安全问题。据专家考证,在《易经》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也有相似的说法:“《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sup>①</sup>“居安思危”这一成语正是从这些思想中引申而来。需要说明的是,在旧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所谓的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居安思危”所表达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告诫封建统治者必须念念不忘王朝的安危。西方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直至以主权为基本属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人类始终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各参战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告了世界上第一批主权国家的诞生,但是,依然未有国家安全理论,这个情况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得以改变。

据有关专家考证,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始于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将“国家安全”这个名词引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是美国一个报纸专栏作家,名字叫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他在1943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国家安全”这个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词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被广泛使用,大约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学术界展开了对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观点各异、各具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国家安全

---

<sup>①</sup>转引自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在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自为首的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背景下,当时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仅仅是“国家”的安全,在他们看来,安全威胁所涉及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威胁的手段或途径也只有一个:军事,维护国家安全的惟一途径同样只有一个,那还是军事。因此,安全研究就是研究“军事力量的控制和使用、以及威胁。”其重点就是研究军事战略和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从而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四大理论:威慑理论、裁军理论、军备控制理论与有限战争理论。<sup>①</sup>这个阶段的研究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阶段。

在此期间,西方学术界对国家安全的主流看法是现实主义安全观。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动力是国家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利益,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安全利益,世界各国都不择手段地展开争夺权力的斗争,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各国为了追求权力而进行的争夺。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遭受外国军事攻击的威胁,因此,所谓“国家安全”就是保护本国免受战争或战争威胁。要获得安全,只有两种途径:或是尽最大可能扩充本国的军事力量,通过获取军事优势而获得安全,或是各国达成协议或默契,实现各国军事实力的大致均衡,维持临界的和平与安宁。

正是在这种安全观的指导或影响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并组织军事集团、争夺势力范围;世界各处地区性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各国相互以邻为壑,竞相扩充军备,结果使各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于是扩充军备与安全威胁彼此消长,形

---

<sup>①</sup>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5页。

成恶性循环,整个世界都由此构成的陷于“安全困境”。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东西方关系逐步走向缓和、1973 年爆发的石油危机、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使经济、科技、环境等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作用日益突显。面对世界各国陷于“安全困境”的尴尬局面,人们不仅仅继续关注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开始注意:什么是安全威胁,除了军事威胁之外,国家是否还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安全威胁?如何认识安全威胁的指涉对象?安全与非安全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安全的本质?安全所涉及的对象仅仅是国家,或是人们个体?或是全球人类社会?国家在提供个人安全的同时,是否也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怎样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利益与国际社会安全利益的相互关系?当今世界谁来代表和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利益?

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安全不仅仅是指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而且还包括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等,安全不仅仅是依靠国际竞争或军备竞赛获得,而且可以通过谋求国际合作来实现。但另一派学者认为,安全的实现,不仅应依靠国际合作,而且应该依靠建立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这一点比国际合作更重要。由此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于安全问题的真正研究。于是诸如“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概念相继出现,鉴于国家安全与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二者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人们愈加关注危机的监控,大量相关学科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被纷纷引入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并由此形成了诸如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理性选择论等谋划国家安全的理论学说;在这个阶段,一系列重大现实课题诸如美苏中大三角战略关系、核军备控制和核裁军、经济相互依存与

安全机制、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安全的相互关系等等成为西方安全研究的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格局的瓦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一方面失去了苏联宿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带来的新的安全威胁,需要修订自己的安全战略。冷战格局的瓦解给国际政治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现象,暴露了以往安全理论方面存在的缺陷,特别是传统安全理论忽视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一情况促使西方一些学者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对安全问题的研究继续朝着“综合化”方向深化,从纵向看,提出了“个体安全”、“社会安全”、“人类安全”、“全球安全”等概念。一些学者对传统安全研究提出了批评,主张把研究的重点从主权国家的安全转向所有的人的安全和所有的社会的安全。在横向方面,提出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等概念,最大限度地扩大安全概念的外延,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人道主义干预”战略、“环境安全”战略,以期实现他们的所谓对安全的“全球治理”。

与此同时,从事国际安全研究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不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而且许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包括社会心理学家也都纷纷加入这一学科研究队伍中来,并引入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西方女权运动也介入安全问题的讨论。女权主义要求重新定义传统的“安全”概念。她们认为,传统的安全观一直关注军事力量以及如何从物质上保证国家免受来自外部的战争或战争威胁,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因为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武器解决安全问题,战争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依

赖战争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的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另一方面,女权运动强调,对付生态环境的恶化应该成为安全概念的重要部分,她们认为妇女与自然界、生态运动与女权运动都存在天然的联系,都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平等相处,因此,安全问题的研究应该考虑女权运动的要求。

建构主义安全观也运世而生。建构主义认为,安全问题的形成不仅是物质力量支配的结果,不仅是因为存在着客观的安全威胁,而且还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国家将某个问题“安全化”的意图在于谋求某种特权,并倾向于手段的军事化,因此建构主义认为不应当拓展安全外延,而应朝“非安全化”方向努力,将一些问题逐渐从安全日程上撤下来,而不是加入新的问题和对象。<sup>①</sup>

西方学术界对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已经从军事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指导政府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依据。在实践方面,西方主要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其国家安全战略的策划已从依靠少数决策者的个人经验和智慧演变为依托群体的智慧和高科技手段的科学运用,并依法建立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指挥的,综合政府决策机构和智囊系统、情报信息系统组成上下贯通、左右相互协调、拥有高技术装备武装的国家安全管理机制,这个机制不仅负责定期制定和评估国家中长期总体安全战略,而且还负责各个领域的安全行动的决策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置。

---

<sup>①</sup>见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西方学者研究安全问题所取得成果,包括许多概念、范畴、原理包含着不少积极的成分,但这些概念、范畴、理论毕竟是西方学者对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维护西方大国的私利以及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总想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当作惟一的范式,要求发展中国家仿效等局限性,因此只可以批判继承和借鉴,而不可全盘照搬。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具有极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就提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邓小平也曾这样告诫中国的政治家和国民:“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他们不仅对维护国家安全做过许多深刻的理论论述,而且一贯信守和履行“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诺言,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安全。

但是,由于众多原因,我国学术界对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显得相对滞后,不仅起步晚,而且研究水平有待提高,成果也不够丰富,至今尚未建立起系统的、具有中国学者独到见解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仍然保持着以国家中心主义和权力政治学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研究传统。”<sup>①</sup>

---

<sup>①</sup>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中译版: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在实践方面,我国国家安全管理机制也还不够完善。我国虽设有国家安全部门,却长期未能建立健全由中央统一领导并指挥的协调各方、上下贯通、严密、规范、高效的国家综合安全管理制度;也没有正式制定和公开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建国以来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谋划,但并未按照法定程序正式制定综合的国家安全战略”。<sup>①</sup>

当今世界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现代文明的进程日新月异,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在获得了极大的改善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更严重的威胁,各种危机频频发生,核电站事故、大地震、口蹄疫、疯牛病、禽流感、“非典”病毒……等等,如同洪水猛兽般扑面而来;另一方面,自20世纪末以来,国际局势并没有像一些西方人士所预想的那样,随着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的瓦解,一个“太平盛世”降临人间,而是冲突四起,危机不断,金融风暴、“9.11”、两次海湾战争,天灾与人祸交加,使世界显得更加动荡不安,“国家”作为世界各民族生存与发展所赖以依托的特定形体,其自身安全也就倍受关注。

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什么是国家安全?”、“应该怎样维护国家安全?”,成为了我国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专家学者围绕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及外延、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及其生成根源、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互关系、维护国家持久安全的战略方针、政策和原则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种种不同意见。

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的答案,并进而

---

<sup>①</sup>金铧:《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第7页。

为建构和完善我国的国家安全理论作出自己的努力,故此,本书力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借鉴法学等相关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从研究什么是国家安全开始,逐步展开对于国家安全概念、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的种类和特点、国家安全管理机制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等问题的研究,并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看法。

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国家安全概念篇,由第一、二章组成。主要研究什么是国家安全,如何界定国家安全。第一章国家安全的定义和内涵。第二章借鉴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范畴,论证国家安全的构成要件及其相互关系。第二部分:当代国家安全威胁篇,由第三、四、五章组成。主要研究当代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种类、特征、表现形态、成因。第三章研究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第四章分析非传统威胁因素。第五章讨论当代国家安全威胁的表现形态、根源与特点。第三部分:国家安全维护机制篇,包括第六、七、八章的内容。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研究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问题。第六章分析新世纪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第七章对于世界主要国家安全管理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并借鉴吸收其合理成分,思考中国应如何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综合性国家安全机制。第八章讨论国际安全合作的基础,评析当代国际安全合作的模式和机制,探讨其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并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如何加强与完善国际安全合作的建议。

本书所要力图阐明的主要观点如下:

1.即要适度扩展对安全概念与安全威胁的考察视野,又要避免无限扩大安全概念和安全领域。当前的学术界主要争议在于是否应该拓展安全概念的外延。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冷战格局的瓦解以

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安全概念的外延应该扩大,安全要素应该多样化。一部分学者从横向上拓展安全的外延,提出国家安全应从军事安全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甚至人类心理等方面的安全;还有一些学者则从纵向上拓展安全的外延,提出国家层面的安全应该延伸到个人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安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当代国际关系已越来越体现为共同利益的结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等所谓“新安全观”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热门的话题;

但另有一部分学者对“安全”概念的扩展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新安全观”所表达的内涵并不新,那些把“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区分开来的所有特点几乎在传统安全观中都已具备。有的学者批评,“新安全观”过度拓展了安全的概念,几乎把所有需要引起世人重视的社会问题都纳入安全领域,如此做法会导致安全概念的无限拓展,将造成“观念上的安全困境”,最终便会导致实践方面的“安全困境”。但是,如何防止安全概念的无限扩展?扩展安全概念的“界限”何在?批评拓展安全概念的学者却没有对这两个问题给予回答。

笔者以为,面对冷战后国际安全局势的新变化,确实有必要适度扩展对安全概念与安全威胁的考察视野,但应避免无限扩大安全概念和安全领域。除了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依然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外,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数量在增加,作用也在增强,这是事实,但是我国学术界近年对于安全问题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无限扩大安全概念和安全领域的倾向。许多学者竞相在“安全”这个词语的前面加上“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环境”、“信息”、“社会”等等字眼,从

而衍生出众多“安全”问题,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所涉及的领域几乎覆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维护“安全”几乎成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同义语。然而,他们对于诸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等所谓“非传统安全”的概念界定却显得漫不经心,以致过于宽泛,结果是无法区分安全领域与其他领域。

以人们谈论最多的“经济安全”为例,有的学者给“经济安全”下的定义是“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国家经济在整体上基础稳固,健康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sup>①</sup>有的学者则认为,“经济安全主要指的是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金融规则和机构的稳定性、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等内容。”<sup>②</sup>这些定义无非是在强调国民经济的稳健、持续发展,或者强调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问题实属于发展问题,而非安全问题。

还有不少学者热衷于“文化安全”或“文化主权”的讨论。他们将“文化安全”界定为“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受异国有害文化的渗透和侵犯。”至于如何实现“文化安全”?他们的回答是“并非僵化地固守陈旧的文化,而是要文化创新,建设创新文化。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全球文化融合的机遇,吸取西方文化精华,结合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创造出适应时代潮流,更加灿烂文明的民族文化。”<sup>③</sup>如果照此解释“文化安全”,那么“文化安全”的

①马维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②田禾:《论非传统安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4期。

③马维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

概念所标示的对象并不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才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是古今中外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发展史的本来面目,历来如此。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其中心课题就是解决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问题,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在与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兼收并蓄、扬长避短、趋利弊害,创造着富有时代特色和本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同时也给世界文化宝库添砖加瓦,使之更加绚丽多彩、光辉灿烂。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借用“时髦”的话语:“如何实现文化安全”做了精辟的回答:“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个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还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为例子,说明对待外国文化应“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sup>①</sup>由此可见,“文化安全”维护者们所倡导的“吸收借鉴”,加以“创新”的“文化安全”问题实属文化领域的,而非国家安全领域的课题。所以,所谓“文化安全”实属“文化建设”,而非国家安全。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707页。

其实,许多试图重新定义安全以及扩大安全概念的努力只不过是为了强调某个问题的重要性,呼吁人们倍加关注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生存所带来的挑战,但是,众多“安全”问题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千差万别,威胁“安全”的来源也同样是千差万别,解决这些问题“安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也大相径庭,其中有的确实属于安全问题,有的则属于其他科学领域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即便不被冠以“安全”的头衔,也同样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正在努力加以解决。但是如果把所有认为“重要”问题都纳入国家安全的研究视野,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势必使“安全”问题成为了无所不包、无处不存在的大“问题”;不仅安全概念将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也将失去对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安全与非安全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国家安全领域与非国家安全领域的界限究竟何在?

为了确定国家安全领域与非国家安全领域的界限,就有必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安全”上来,就必须从科学界定安全的概念出发。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根据。”“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sup>①</sup>因为任何课题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对其基本概念,尤其是关系到本课题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作出科学界定,其任务就是明确揭示其研究对象内在的

---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8-309页。